

越国文化

主编 方杰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越国文化

主编 方 杰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金奕
特约编辑 龚建星
封面设计 方杰 邹越非

越 国 文 化

方 杰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9 字数 337000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

ISBN 7-80618-407-4/C·62

定价: 24.00 元



石 钺（新石器时代）



有段石铤（新石器时代）

石 犁（新石器时代）





钶 (春秋)



伎乐铜房 (春秋)



三足铜鼎 (春秋)

戍(越)王者旨於賜劍 (战国)



戍(越)王石矛 (春秋)





青铜鸠杖 (战国)



青铜钺 (战国)



青铜钺 (战国)

青铜镰 (战国)





青铜鋤 (战国)



青铜削 (战国)

青铜构件 (春秋)





原始瓷豆 (春秋)



原始瓷盃 (战国)

原始瓷匜 (战国)





印纹硬陶罇 (战国)

印纹陶尊 (春秋)



印纹硬陶罐 (春秋)

黑陶豆 (战国)



黑陶兽面鼎 (战国)



黑陶甗 (战国)



序 一

《越国文化》为系统、全面、科学地研究于越文化又跨出了可喜的一步,值得庆贺。

文化,广义当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学术定义,比较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者,是专家们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当中,他凭借符号的应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特殊成就,其中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方式和模式。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以价值观尤为最重要。”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知道,文化是人为的和后天习得的,而不是自然的和先天遗传的,但它要受自然环境、条件和规律制约,不能违背自然。《越国文化》把于越文化放到当时自然、社会的环境、条件中去,揭示了河姆渡文化的超前发展、海进后的滞后现象及句践立国兴邦的又一次超前的历史事实,无疑亦是一条正确的学术通道。

诚然,文化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创造的,继而靠人们的学习、继承和运用而不断地积累、遗传和发展。它虽以经济为基础,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越国文化》运用历史文献资料,结合考古文化,对越国这一特定的地域,从物质文化、经济形态、社会、宗教、艺术等文化领域和文化要素,进行了广泛的认真的探索,这也十分可喜。但我还想指出两点:第一,因为文化的各个特征在一个区域的分布是千差万别的,文化区域亦没有一个绝对的界定原则,因此,在时间和空间上还可以放得更长、更大些,可以上溯到五万年前的“建德人”,下延及秦汉、六朝;

大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沿海诸省,小则集中在中心区域今之绍兴。由于历史文化的相互趋同、相互融合,还应结合吴文化、楚文化等姐妹区域文化,乃至中原文化的研究。然后,再作连贯的思索和科学的分析,以便发掘出更深层次的于越文化底蕴。第二,于越存在于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的连接点上,已有部分载于史籍:《山海经》已露端倪,《左传》有零星记述,《国语》有《越语》专篇,《史记》有多篇传文,《越绝书》、《吴越春秋》更是史志专著,《论衡》及历代类书均涉猎不少,足可供我们下一番考证核实、分析综合的苦功。更为重要的是有待于发掘深藏于地下的有关越国文化,如已发现的绍兴马鞍山、壶瓶山、白洋山、袍谷等遗址的文化,以及余姚市的河姆渡文化,余杭市的良渚文化,它们距今远则七千多年,近则二千年,都是研究越国先民的丰富的文化宝藏,若能依靠现代的科学手段,把它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定会在人们面前展现古越先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和成就,从而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养料。

纪根立

一九九六年二月

序 二

(一)

越族是一支古老的部族,越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要研究这种古老文化,有史前时期的,也有历史时期的;有这种文化的中心地域绍兴一带的,也有这种文化流散在外地甚至域外的;不能截然分割开来。当然,中心地域是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期里,研究古老文化的唯一法宝就是经书,或许再加上正史之首的《史记》、《汉书》等。我当然不反对经书,我是一个从读经书的家庭里出来的人,六七岁时就在一位清末举人、我的祖父的教导下,读熟了《学》、《庸》两篇。以后又读熟了其他不少经书。经书在不少方面,至今仍然是权威的。我当然也不反对正史,已故的历史地理学权威谭其骧先生曾经说过:“近年来我曾一再劝告接触到的各地方志办的同志不能轻信旧方志,特别是旧方志中关于明清以前的古代建置沿革,必须用历代正史地理志、总志和《水经注》等一类地理专著相互考证核实^①。”说明了谭先生对正史的重视程度。当然,正史也有很大的毛病,我不久以前就在拙著《郦道元评传》^②一书中直截了当地批评过正史^③。但是应该说,正史的许多资料,特别是《史记》和《汉书》,确实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由于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人们对于经书和正史资料是非真假的鉴别能力在不断提高。时至今日,它们之中的某些资料,就连小学生也不会信以为真了。例如记载禹的伟大业绩的《禹

贡》，就是一部崇高的经书。但是按《禹贡》记载的水利工程量，即使能使用我们今天所有的建筑机器，大舜帝又能从国库中拨出这样一项巨款，而且发出一张通行证，让禹在大舜管辖不了的东夷、西戎、南蛮通行无阻，则十三年中也断断完成不了如此庞大的工程。所以冀朝鼎于1936年用英文在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①一书，在第四章《禹和洪水的传说》节下说：

“顾颉刚对古代中国历史文献的各种资料，作了大胆地分析与比较之后，便否认了关于禹与洪水的传统观点。这种传统观点把禹说成是在工程技术方面一个伟大的统治人物，他驯服了在中国引起洪水泛滥的河流，把中国(北部)从一次特大洪水中挽救出来，并建立了夏朝”。

冀朝鼎所说的顾颉刚对禹的“否认”，就是否认包括《禹贡》在内的许多经书以及《史记》、《汉书》中所传播的这个改天换地的庞大水利工程的荒唐故事。但顾颉刚却承认了禹的另一面，这就是他在《古史辨》^②中所说的：“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

上述种种，已经涉及到古代经书和正史对于越文化记载中的一些现代人看来无法接受的东西，留待以下再说。当然，在古代越文化的研究中，经书和正史，特别是正史中的《史》、《汉》，仍然是重要的文献。还有一些古代越地的地方文献，如战国古籍《越绝书》^③，汉代的《吴越春秋》和《论衡》等，价值更是不可低估。但有一点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即不管是经书、正史或其他，我们统称为文献资料。在过去，这是学者研究古文化的唯一手段，而时至今日，我们必须说，文献资料是研究古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假使也和过去一样地把它当作唯一手段，那么，这样的研究必然要误入歧途。今天，我们从事这类课题的研究，除了多学科共同合作，或者说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外，没有其他途径可走。

我第一次发表多学科研究古文化的意见是在日本佐贺县的吉野里弥生代遗址现场。这是1989年冬季,当年我应国立广岛大学之聘在该校任教,但也到附近的广岛女子大学和修道大学等校作过若干课题的学术演讲,由于这些学术演讲中有一个题目是《中日两国的史前交流》被当地的传播媒介作了报道,于是九州佐贺电视台台长内藤大典先生热情地邀请我们夫妇去考察正在复原的吉野里遗址。在遗址现场,好几位考古学家和记者,不断地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我在回答了许多问题以后,然后提出多学科研究的建议。我说,我是一个历史地理学者,我所见到的其实仅仅是这个遗址的一方面,要彻底弄清这个遗址,应该对它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后来我把这个说法正式写成了文字。我说:

“这类课题,过去常由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从事研究,现在看来,单靠这些学科恐怕也不足以获得全面和正确的研究结论。应该组织更多的学科,如地质学、地史学、第四纪学、古地理学、古气候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地名学、语言学等学科,共同来从事这个课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要努力跳出一些旧的窠臼,而尽量利用新的科技成果,如放射性碳素测年,热释光测年,孢粉分析,沉积物分析,卫片判读,泥炭层的勘查测定,贝壳堤和古海岸的勘查测定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主观臆测,获得客观的和有科学依据的结论。”^②

在上述意见中,除了多学科以外,我特别强调,现代科学技术和检测手段。我在拙作《评〈浙江文化史〉——兼论古代越史中的几个问题》^③一文中曾经举过现成的例子。我说:

“文化史研究使用了现代科学技术和新式检测手段,许多过去无法考证或考证错误的问题,都能获得正确的结果。例如,仅以热释光测年这种手段为例,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当这种手段刚刚为人们所掌握之初,它就使牛津大学考古所收藏

的数十件中国‘辉县陶’暴露了它们的假骨董原形。而这些假骨董,在收藏以前都是经过自以为经验丰富的行家们的鉴定的。”

在研究古代越文化这个课题中,这是我开宗明义要说的话。

(二)

我在上述《评〈浙江文化史〉》一文中曾经指出:“文化发展的背景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脱离人文景观的自然景观论证,那纯粹是古地理学或地史学的研究任务;但脱离自然景观的人文景观论证,这种论证由于缺乏落脚点,往往不着实际”。

由此可知,我们研究古代绍兴的越文化,首先必须研究这个地区的古代自然环境。但古代是个漫长的时代,在一个漫长的时代中,这一带出现的一切人类活动,必须与它的自然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今绍兴一带,不论是范围较大的宁绍平原,或是地域较小的山会平原,从晚更新世以来,曾经经历过三次海进和海退的过程,三次海进是按每个时代海洋中盛存的一种肉足纲原生动物有孔虫(foraminifera)而定名的。掌握晚更新世这个地区海进、海退的过程,对于这里的古文化研究至关重要。我在前述《多学科研究吴越文化》一文中曾经指出:

“因为要研究一个地方的上古文化,首先要清楚的是,当时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是陆地,还是海洋;是一块冰雪覆盖的陆地,还是生物丰富的陆地?有些人不愿从古生物学和体质人类学来研究建德人和越人的关系,而是穿凿文字,从传说中的禹来进行研究。诎不知‘禹敷土,随山砍木,莫高山大川’的时候,宁绍平原还是卷转虫海进时代的一片海水。”

上面所说的三次海进,第一次是星轮虫海进(asterorotlia),发生在距今10万年以前。迄今为止,山会平原甚至宁绍平原都还没有发现过这次海进和海退的遗迹。当时的会稽山地和山会平原发